



戴一峰 / 著

区域性经济发展 与社会变迁

——以近代福建地区为中心

岳麓书社



南强史学丛书

戴一峰 / 著

Th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Focus on Modern Fujian Area

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以近代福建地区为中心

岳麓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以近代福建地区为中心 /

戴一峰著. —长沙: 岳麓书社, 2004

ISBN 7-80665-475-5

I. 区... II. 戴... III. 区域经济-经济发展-福

建省-文集 IV. F127.5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81479 号

区域性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

——以近代福建地区为中心

作 者: 戴一峰

责任编辑: 饶 毅

封面设计: 黄 朝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新民路10号

电话: 0731-8885616 (邮购)

邮编: 410006

2004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20

字数: 470千字

印数: 1-2,600

ISBN-80665-475-5/G · 387

定价: 35.00元

承印: 湖南东方速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湖南省长沙市河西高新区M1-3栋

邮编: 410013 电话: 0731-880785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

出版缘起

厦门大学历史学系已经走过 80 多年的风雨历程。她建立于 1921 年，是厦门大学最早设立的系科之一，长期以来为国家培养了数千名的本科毕业生，数百名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成为培养优秀人才的知名摇篮。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辛探索和薪火相传，我系形成了深厚的学术传统和显著的办学特色，现拥有专门史全国重点学科、国家历史学科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下设 6 个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8 个硕士学位授予点），并与海外许多著名大学和科研机构建立比较稳固的学术交流和科研合作关系。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我系在教学与科研相长思想的指导下，继承发扬传统研究特色，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学科生长点，科研论著迭出纷呈，受到学术界、教育界同仁的瞩目与赞誉。

为了进一步推动我系的教学科研事业，更好地展示和交流有关成果，我们特推出这套丛书，以期与同志友好为繁荣 21 世纪中国历史学科而共同努力。

厦门大学历史学系

2003 年 8 月

论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生长点

(代前言)

尽管学术变革与突破并非常常发生在世纪之交，但世纪之交无疑被人们谈论学科发展与变革的好时机，因为它总是以其特有的时间魅力刺激人们的想象力。弹指间，中国经济史学从 20 世纪初由一批研习西方近代历史学、经济学的学者开创至今，业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坎坷历程。回顾中国经济史学演进、发展的历史，实事求是地总结其成绩与不足，探测其新世纪的发展前景，磋商切实可行的拓展途径，如今可谓恰逢其时。事实上，近年来，中国经济史学界对本学科的发展问题已多有议论，并提出了不少精辟的意见^[1]。这里拟就本学科发展的生长点问题，谈谈自己粗浅的认识，就教于方家。

一、生长点的土壤：历史与现实

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需要培育新的学

科生长点，即开拓新的、有发展潜力的研究领域。新的学科生长点的培育并非空中盖楼、沙上筑塔，它必须立足于如下两片土地：一是对已有的学术成果的充分认知和实事求是的评估，即要有一个准确的、科学的学术史的回顾；二是对现实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敏锐感应，即要有强烈的现实感。

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状况作或长或短时段的回顾和总结，是学术界不断有学者在做的极有意义的工作^[2]。世纪之交，更有学者对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得失，作出比较全面、认真的总结^[3]。得益于这些研究成果，并考虑到这里拟讨论的问题，我们仅集中关注以往中国经济史学界在研究领域拓展上的得失。就此而言，最好的路径似乎是从该学科领域的入口处，即从学科对象的认知开始。

经济史学的对象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至今似乎还没有一致界定的老问题。这个问题在 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初曾引起了许多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经济史学的对象包括不包括生产力。主流观点强调经济史学的对象只应当是生产关系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不包括生产力；生产力至多只是作为一种背景被关注^[4]。80 年代初，经济史学界一度陈案重提，或主张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为对象；或主张以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对立统一运动为对象；或主张以社会经济结构（系统）为对象，出现了多种不同观点。然尚未形成一致意见便很快归于沉寂^[5]。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研究对象的长期模糊不清毕竟不利于学科的长足发展。

我们以为，从本源上说，经济史学的对象应当是历史上人的经济活动；经济史学追求的目标就在于真实、准确地再现人类社会过往的经济活动，由此获取、提升对当代人有益的信息和启示。人类的经济活动由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 4 个基本环节构

成，并且总是在两种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下展开的。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分解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人对自然的影响，它包括人利用、征服自然能力的发展、变化，即生产力的演化，和人的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一是自然对人的影响。它包括自然环境作为一种结构性原始要素，对人的经济活动产生的制约作用，以及在人的经济活动影响下变化着的自然环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反作用。而人与人的关系即包括我们所熟知的构成生产关系总和的各种经济关系，也包括人们的亲属、同乡、朋友、同学等多种人际关系和人们在宗教、艺术、政治等非经济活动中形成的各种社会关系。把在上述多重关系作用下展开的人的经济活动作为经济史学的对象，其视野就大大地扩展了。然而，回顾百年来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由于受经济史学研究对象定位的制约，研究者的目光大多仅仅关注生产关系，而且事实上仅仅关注生产关系的一部分，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关系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经济形态^[6]。影响所至，研究者笔下的经济史失去了它原来丰富多彩的本色。有学者指出，80年代以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存在着“重生产关系、轻生产力，重生产、轻交换和流通，重典章制度、轻经济运行及其机制，重经济基础、轻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重经济因素、轻社会文化因素，重阶级斗争作用、轻人口因素作用，重断代研究、轻区域研究和专题研究，重汉族和先进地区研究、轻少数民族和后进地区研究等偏向”^[7]。我们认为，造成上述“一重一轻”偏向的原因，就个案而言固然很多，但整体而言，其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应是学科对象定位的偏颇。不过，这同时也向我们提示了新的学科生长点之所在。

另一方面，学科生长点的发育必须，而且只能植根于现实。

史学与现实的关系,是学术界一个颇有争议的命题。以往的争论似乎一直围绕着“史学是否要为现实服务”这样一个传统命题展开。形成的主流观点对此持有肯定意见。但近二十年来,由于对文化大革命期间极左思潮干扰下“影射史学”横行的强烈义愤,人们对史学的现实服务功能产生了怀疑。部分学者重新主张“为历史而历史”的所谓“纯史学”^[8]。我们认为,史学与现实的关系应当是一种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史学以其对历史经验事实的科学重构和剖析“服务”于现实。我们给服务二字加上引号,是因为我们想强调,史学对现实的服务,不应当蜕化成史学对现实需求的盲从和屈从,即仅仅从历史经验中为现实需要寻找根据,制作脚注。史学应当以强烈、敏锐的现实批判精神引导人们审察现实,认识现实,从而成为改造现实活动的向导。这意味着,史学应当立足于现实,且高于现实。另一方面,现实本质上就是历史的延伸体,作为历史发展结果的现实,也会为人们重建历史打开更广阔的探索空间,提供源源不断的启示和更准确的理解。人们所熟知的“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9]这一著名论断,表达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因此,中国经济史学新的生长点的生命力,必然维系于它的现实性。

二、生长点的萌发:自然与文化

令人欣慰的是,改革开放的二十余年来,在现实变革需求的有力推动下,中国经济史学已经发生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变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一个有目共睹的突出成果是学术界突破以往囿于生产关系的狭隘眼界,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角度方面作了不少尝试。这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史学工作者们对迅猛发展的

社会经济现实的积极回应。举凡生产技术变革、企业制度更新、企业文化创立、企业集团形成、价格结构演化、价格周期波动、消费结构调整、市场需求变动、城乡经济互动、经济政策更新、市场组织变迁、经济社团演化、海关制度更替等以往没人或几乎没人问津的领域，都开始受到不同程度的关注，问世一批较有质量的成果。这为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新的生长点的发育，创造了良好的基础。事实上，就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史学界努力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实践中，一些新的生长点已经破土而出，令人瞩目。这里不妨列举两例。

第一，人与自然。诚如上述，作为经济史研究对象的人的经济活动，总是在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双重关系下展开的。但以往的研究基本上忽略了前者。80年代后，随着学术界对经济史学对象认识的转变，部分学者开始关注中国经济发展史中某一历史时期生产力的实态及其演化的历程，并陆续有学者发表文章，讨论我国各历史时期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但为数甚少^[10]。有关人与自然间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仍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近十余年来，由于急剧的、大规模的经济开发使生态环境出现恶化趋势，保护环境的呼声日益增强，可持续发展问题日益引人注目，才推动了一些研究者开始尝试深入探讨经济活动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相关的论著不仅在数量上有所增加，而且在质量上也有所提高。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包括挖掘、爬梳中国传统文化中业已产生的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朴素认识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总结、探讨中国历史上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变化两者间的互动关系等等^[11]。但至今为止，这一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不仅研究范围的展开还比较狭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一领域的理论范式和研究方式均未成型。惟其如此，它才更显示出一个极有潜力的生长点的无穷魅力。

第二，经济与文化。经济与文化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制约的两大社会范畴^[12]。一方面，任何文化的形成和发展都是以人的经济活动为基础和载体的。经济的发展牵动、促发着文化的变迁，同时也体现着这一变迁的内容；另一方面，任何经济活动主体，不论是个人、家庭，还是企业，其经济行为又总是在一定的文化环境中展开的。因而，其行为的机制以及规范这些行为的经济制度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所处文化环境的引导和制约。从文化环境的角度来探讨人们的经济行为，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但是，长期以来，在中国经济史学研究领域中，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化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问题几乎被完全排除于研究者的视野之外。究其原因，一者因为长期以来学术界过于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忽略和淡化了后者对前者的导向性反作用。二者也因为来自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影响。事实上，就经济论经济是经济学界自新古典经济学派创立以来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基本特征。该理论把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放入经济理性的简单框架中加予解说。从而把包括文化在内的一切非经济因素的作用排除在外^[13]。

近二十余年来，由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就，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对东亚、东南亚经济发展与文化环境关系的一系列深入研究和讨论，从而促使了学术界对经济与文化互动关系认知的不断加深。问世了一批颇见新意的论著。这一研究最初是从对当代经济现象的关注开始的，继而为部分经济史学者所借鉴。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有关中国乡土文化与华人企业经营、商业运作两者间的内在联系，有关中国传统人际关系网络形成的文化背景、关系网络结构与功能的特点及其对商人经济行为的影响，有关地域文化特色与当地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等问题的讨论^[14]。但毋庸讳言，研究工作迄今仍局限于一个较

狭小的范围，文化与经济间复杂生动的关系还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展开^[15]。足见这一研究领域还有大片未开垦的处女地。

三、生长点的成长：理论与方法

正如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增长点会扩展成规模经济，进而形成新的经济部门一样，有发展潜力的学科生长点也会茁壮成长，逐渐蔓延成一片广阔的原野，最终形成新的学科分支，发育成新的学术流派。这是学科良性、有序的发展。这一成长过程的关键在于理论和方法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老一辈经济史专家在各种不同场合对中国经济史学的发展提出了自己从多年科研实践中总结出的真知灼见。他们无一例外地主张要重视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如吴承明认为：“要发展经济史研究，我主张要扩大理论视野，博采研究方法。近年来，我们经济史著述，在理论和方法上已有一些革新，但总的说，还是老一套的占多数。”^[16]吴老还身体力行，接连发表了一系列介绍和讨论经济史学研究方法和理论的论著，影响甚为广大^[17]。

如果说理论和方法对经济史研究整体而言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性，那么，对生长点的发育和成长而言，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就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生长点的发育和成长在很大程度上必须依赖于以新的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新视野和新视角。借助于新的视野和视角，我们不但得以重新爬梳、解读已有的史料，发现新的问题，而且可以扩大我们查阅资料的范围，重新审察以往被我们忽略的资料，找到新的研究焦点。事实上，迄今为止经济史学研究中新生长点的发育和成长，无一不是得益于理论与方法的革新和突破，得益于新的理论与方法的启示和支撑。另一方

面，当代科学发展的一大突出特点是不同学科间的大量交叉、渗透，各学科理论、方法的借用、衍生，由此不断形成新的学科。原本就具有交叉学科特征的中国经济史学，在其长期的发展历程中，主要是运用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其间也曾吸收了社会学的部分方法和理论。但总的说来，到 20 世纪 80 年代，面对当代学科发展潮流，这门学科的方法和理论都已显得狭窄和陈旧。近二十年来，学界不断有人尝试在吸收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同时，也积极借鉴人类学、人口学、地理学、管理学、环境科学等诸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框架。在这一努力中，新的生长点可以说是得风气之先，具有天然的优势。因为它们原来就是当代学科发展潮流的产物，浸染、感应着这股潮流的现实底蕴。

与理论和方法创新密切相连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中国经济史学的本土化。学科发展本土化是自上个世纪末以来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共同面对的一个日益强烈的问题。回顾中国经济史学的百年发展史，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从 20 世纪初中国经济史学萌生后，这一学科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依存于用从西方的经验事实归纳、抽象出来的理论来诠释中国人的经济活动和中国经济演化的历史进程。这自然引致这样一连串的问题：由西方经验事实归纳、生成的人文社会科学范式是否可以直接用于解释中国的社会经济现象？中国社会经济的历史演化是否有其独特性？这种经验事实的独特性到底具有什么样的理论意义？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有助于我们的理论和方法创新，并走向对培育有助于中国经济史学本土化的生长点的追求。

人类经济活动具有某些共通性，这就使得我们可以引入西方学术界从西方历史经验事实中提炼出来的各种概念、范畴和原理，运用其理论和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经济演化的历史进程及其

规律和特点。但是在中国特有的地域文化环境下展开的中国人的经济活动，又显然带着不同于西方人的种种特点。如由血缘和地缘关系编织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对中国人的经济行为的强大制约作用和在生产、交换、信贷等经济活动中发挥的举足轻重影响，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因此，中国经济史的研究在积极吸收、引进外来的理论和方法时，要力求避免成为外来理念的注解和演绎；研究必须建立在对中国人的经济观念和行为及其内在运作规范和演化特点的真实、准确的体验和理解的基础上。由此建构中国经济史学自己的问题意识、解读方法、分析框架和学术范畴。

当然，一切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是必须建立在对经验事实个案的深入研究上的。这是一个脚踏实地，艰辛行进的历程，来不得半点浮躁和讨巧。以区域经济史研究为依托，围绕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与经济变迁间的多重关系，展开个案探讨，就是朝着这一方向迈出的值得尝试的努力之一。我们期待着更多的学科生长点萌发，健康成长。惟其如此，我们才有希望看到新世纪中国经济史学灿烂的发展前景。

-
- [1] 参阅张仲礼：《经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市场史、现代化和经济运行：吴承明教授访谈录（1998年12月25日）》，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1期；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载《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虞和平：《经济史》，载张海鹏主编：《五十年来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
- [2] 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当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研究》编辑部所做的工作。参见《中国经济史研究》每年发表的《中国经济史研究综述》，以及1996—1997联合增刊上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二

十年》等。

[3] 参阅上引李根蟠、虞和平文章。

[4] 孙健：《国民经济史的对象、方法和任务》，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2期；李运元：《试论国民经济史研究的对象》，载《经济研究》1957年第6期。

[5] 魏永理：《略论国民经济史的研究对象》，载《兰州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孔经纬：《关于国民经济史的一些理论问题》，载《吉林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秦佩珩：《中国经济史研究应走的新途径》，载《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吴承明：《关于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意见》，载《晋阳学刊》1982年第2期。

[6] 严中平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中曾指出建国后三十多年来经济史研究中的若干明显不足和缺点。其中之一就是“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庸俗化的倾向。比如把生产关系的丰富内容变成所有制的单一内容”（见严中平：《在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开幕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1期）。

[7] 参阅叶茂：《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综述》，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1997联合增刊，页34。

[8] 葛懋春：《历史科学概论》，页30~44，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杜经国、庞卓恒、陈高华：《历史学概论》，页135~142，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李振宏：《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页115~136，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页108，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0] 前者如李伯重的一系列研究成果：《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载《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利用》，载《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明清江南种稻农户生产能力初探》，载《中国农史》，1986年第2期等。后者如陈育宁：《鄂尔多斯地区沙漠化的形成和发展》，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王尚义：《历史时期鄂尔多斯高原农牧业交替及其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载《河南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谭作刚：《清代陕南地区的移民、农业垦殖与自然环境的恶化》，载《中国农史》1987年第4期；翟乾

祥:《清代气候波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载《古今农业》1989年第1期。

- [11] 参阅史念海:《隋唐时期自然环境的变迁与人为作用的关系》,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1期;丁栋虹:《传统农业与农业生态危机》,载《经济地理》1991年第3期;戴一峰:《近代闽江上游山区的开发与生态环境》,载《厦门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朱士光:《我国黄土高原地区几个主要区域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变迁概况》,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期;李伯重:《“天”、“地”、“人”的变化与明清江南的水稻生产》,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邹逸麟:《明清时期北部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和气候寒冷变化》,载《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王建革:《小农与环境:以生态系统的观点透视传统农业生产的历史过程》,载《中国农史》1995年第3期;赵冈:《人口、垦殖与生态环境》,载《中国农史》1996年第3期;李根蟠:《农业实践与“三才”理论的形成》,载《农业考古》1997年第1期;刘沛林:《历史上人类活动对长江流域水灾的影响》,载《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李根蟠:《“天人合一”与“三才”理论:为什么要讨论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王建革:《游牧圈与游牧社会:以满铁资料为主的研究》,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3期。
- [12] 对“文化”的界定,学界众说纷纭,大致可区别为广狭两义。本文是在狭义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即将其视为与政治、经济并列,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一个属于意识形态的社会范畴。它包括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思想概念等一系列基本要素及其相应的规范。
- [13] 在经济学界,20世纪50年代以来,这一理论误区遭到以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的有力冲击。尽管没有直接去触动人在经济活动中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经典假说,但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实际上是力图把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作用引入经济分析中,尤其是当他把意识形态理论作为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大基石之一时。尔后,由于“社会资本”这一新的解释范式被引入经济学,理论界对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就愈来愈

愈关注了。

- [14] 参阅 Limlingan, Victor Simpao,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ASEAN: Business Strategies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Manila: Vit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 1986; Redding S. G.,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New York: Aldine de Gruyter, 1990; Gary Hamilton, *Business Network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Hong Kong: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1; Cheng, D., *The Overseas Chinese Entrepreneurs in East Asia: Background, Business Practices and interactional Networks*, CEDA Monograph M 100, 1993; Aihwa Ong and Donald M. Nonini, *Ungrounded Empires: The Cultural Politics of Modern Chinese Transnationalism*,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Dai Yifeng, *Overseas Chinese Business Networks around China's Sea: A Case Study on Tai Yi Firm in Nagasaki(1901-1938)*, *Asian Culture*, 1998, (6); 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 1987 年版; 刘广京:《经世思想与新兴企业》, (台北) 联经出版公司, 1990 年版; 何梦笔:《网络、文化与华人社会经济行为方式》, 山西经济出版社, 1996 年版; 陈明璋:《家族文化与企业管理》, 载《企银季刊》1984 年第 8 期; 张海鹏、唐力行:《论徽商“贾尔好儒”的特色》, 载《中国史研究》1984 年第 4 期; 郭蕴静等:《清代商人的道德观与行商经验》, 载《北京商学院学报》1988 年第 2 期; 周立民:《从徽商的盛衰看文化环境与商业繁荣的相互作用》, 载《财贸研究》1991 年第 2 期; 何筠:《明清时期儒商的经营活动与商业伦理》, 载《求实》1994 年第 5 期; 孙善根:《传统家庭同乡关系与宁波帮的崛起》, 载《宁波大学学报》1991 年第 1 期; 陈钧等:《试论明清时期徽商的经济伦理》, 载《湖北大学学报》1993 年第 5 期; 戴一峰:《清代长崎的同安商人及其贸易网络》, 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6 年第 4 期。
- [15] 举个例子说。吴承明曾经指出:“16 世纪发生的以泰州学派、何心隐、李贽和东林党人为代表的第一次启蒙思潮; 17 世纪发生的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和唐、颜李学派为代表的第二次启蒙思潮; 18 世纪的经学复古; 19 世纪前叶以龚自珍、林则徐为代表的第三次启蒙思潮; 这些思潮对经济发展的制衡作用十分明显, 应是我们研究的重点。”

（见吴承明：《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 [16] 吴承明：《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在中国经济史学会首届学术年会上的开幕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3期。
- [17] 参阅吴承明：《市场、近代化、经济史论》，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传统经济、市场经济、现代化》，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现代化与中国十六、十七世纪的现代化因素》，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4期；《经济史学的理论与方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载《中国经济史研究》2000年第2期。